

从《更路簿》看我国海洋国土教育

梁明月 (LIANG Mingyue), 王倩倩 (WANG Qianqian), 张雪峰 (ZHANG Xuefeng)

摘要

《更路簿》作为我国南海渔民古代航行的重要工具，是一种重要的海洋国土教育资源，其内容体现了我国渔民早期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而过去对于《更路簿》的集体记忆的淡化不利于我国海洋文化的传承和家国情怀的延续。鉴于《更路簿》具有增强学生对国家主权的认同感、有效提升学生大国文化自信等多方面的教育意义，研究建议：应当通过加强《更路簿》的跨学科研究与课程的开发建设等途径，发挥《更路簿》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

《更路簿》；海洋教育；国土教育

基金项目：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SRIP 项目“宁波帮精神的现实境遇与助推策略：以宁波大学为例”

作者简介：梁明月 (LIANG Mingyue)，女，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王倩倩 (WANG Qianqian)，女，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雪峰 (ZHANG Xuefeng)，宁波市社科联 (市社科院)。

Received: 27 Feb. 2025 / Accepted: 7 Mar. 2025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5

Available online: 30 Apr. 2025

Print ISSN: 3078-316X; Online ISSN: 3104-5057 / ©2025 by 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更路簿》是我国渔民在风帆时代的指路明经和海上指南，是古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经验记录。2016年，CCTV发布纪录片展现了《更路簿》的前世今生，指出《更路簿》记载了中国渔民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三沙主权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16)。《更路簿》是一种独特、内容丰富、真实可信、富有情感色彩的教育资源，将《更路簿》系统融入地理、历史等学科课程当中，从而深化学生的海洋国土意识教育，是一种需要深入研究的创新性教育方法。

一、《更路簿》的产生背景及其内容特点

（一）《更路簿》的产生背景

早在海南渔民从事渔业生产活动的初期，《更路簿》已在孕育酝酿之中。在风帆时代，中国的渔民通过观察星象和海洋的颜色等来确定洋流和方向，并对到达的岛礁进行命名。最初的《更路簿》记载在船员们的心中的记忆里，后来这些船员为了传承航海经验，将南海航行的经验记载下来，于是诞生了《更路簿》。

1. 《更路簿》的名称及其内涵

《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或称为《水路簿》《顺风得利》《针路簿》等），是海南民间代代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向、距离以及岛礁特征（中国中央电视台，2016）。“更”原是计时单位，一夜为五更，一昼夜为十更，后来转变成计程单位，即一更时间内的航行里程。对一更的里程，有一更合百里、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一更约合六十里（朱鉴秋，2013）。“路”是指航海罗盘指示的针路，即船的航向；“更路”二字合起来，表示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之间的航向、距离以及航行所需的大致时间；“簿”表示的是承载信息的工具，即本子或册子，一般为绵纸或草纸制成，上面书写更路条文（夏代云、王崇敏，2016）。在帆船时代，每个船长的手中至少拥有一本《更路簿》，记载了他们航行的路线和经验。

2. 《更路簿》的历史传承

《更路簿》最迟出现于明朝初年，成熟于清朝，盛行于清代末期和民国前期，世代流传至今（刘义杰，2017）。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渔民在不断探索实践过程中，将记忆中的更路条文、地名、风力、海浪等信息用文字表达出来，形成了《更路簿》的初稿。此后，历代渔民再根据各自航海实践经验不断对《更路簿》进行修改、补充和验证，使其逐渐完善并形成了不同版本，这种历史传承使得《更路簿》成为一部珍贵的航海历史文献。

最初，《更路簿》是由渔民群体中的少数成员（一般是船主或船长）控制和使用，一般为船长秘藏，多以家族、亲戚或密友之间师徒传承的方式传播。在老一辈海南琼海潭门渔民的记忆里，将《更路簿》交给下一代掌舵人是一种庄严的仪式。接过《更路簿》，不仅意味着接过了那艘承载着全家人生计的渔船，还意味着接过了全船人的生命（《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编委会，2016）。后来，《更路簿》就不保密了，船员都可以看。《更路簿》从封闭性走向了公开化，逐渐由渔民群体的记忆成长为多群体的共同记忆（刘玄宇、张争胜、牛姝雅，2017）。

（二）《更路簿》的内容特点

1. 内容信息

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更路，这是多数《更路簿》的核心内容，记载海南渔民从海南岛东部沿海出发，前往东海（即西沙群岛）、北海（即南沙群岛）的更路，也有东沙更路（阎根齐，2024）。其中，每一条航线都包含了出发地、目的地、航行角度、航程以及岛礁名称和特征等信息。此外，《更路簿》还记录了渔民在南海诸岛的渔业生产活动、岛礁地貌和海况，以及海浪、潮汐、风向、风暴等水文气象信息。

正月（一月）

初一日卯时流东，未时流西

初二、初三日卯时尾流东，申时流西

初四、初五日辰时流东，酉时流西

初六日巳时流东，酉时尾流西

初七、初八日伏流

初九日戌时通门

初十日亥时流东，卯时流西

——节选自《琼州海峡急水门流水表》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编委会（2016）. 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42页）. 海口：海南出版社）（以下简称《南海更路簿》）

这些信息记载在一本册子上代代相传、更新，帮助船员航行在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上，避开种种惊涛骇浪，成为后代船长和船员们的航行的必备工具书。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的老船长卢业发说：

“我14岁就跟着父亲出海了，后来当了船长，都离不开这本更路簿。……一半的航海生涯都记载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上……掌舵的船长，要严格按照更路簿上规定的线路来走，将岛礁作为定位点，到达一个岛礁后，再到另一个岛礁。”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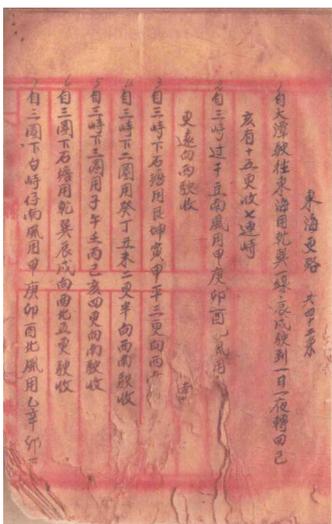
由于年代久远、航行技术的限制以及地域文字的发展变化等方面的原因，以前《更路簿》上面的许多文字内容存在着遗缺，现今学者们对其内容进行了诸多的解释、考察和印证，促进了《更路簿》的传承和可持续性发展。

2. 外表形态

首先在载体的形态上，《更路簿》有抄本、藏本（祖传本）、油印本、整理本等多种形态；多以棉纸或草纸，对折双面，右侧装订，封面有“更路簿”三字（张朔人、张若城，2018）。渔民在旧簿烂得不可用之前会及时抄录新簿，以保存和继续使用。较早时

期保存下来的簿品相老旧发黄，边缘有磨损（夏代云、王崇敏，2016）。一代代船员依靠着《更路簿》在南海之上航行、生活，在它的载体之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其次，在记载方式上，《更路簿》的更路一般按条目书写，每一条表达一条更路，用语精练。早期版本用毛笔小楷竖行墨书，从左到右排列。后期抄本用圆珠笔、钢笔等抄写，有些是竖行抄写，但也有些是横行抄写，从上到下排列（夏代云、王崇敏，2016）。如图为《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的第一页。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

二、《更路簿》中的生活史证明了南海诸岛的主权

（一）中国较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

目前发现的《更路簿》史料证明了中国较早发现和命名南海诸岛。《更路簿》记载了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岛礁共有 140 多个，各岛礁之间的航线 3 000 多条，这些航线形成了网状结构，覆盖了南海岛礁。所有用汉字表示的海南方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系统（阎根齐，2024）。这些命名大多基于岛礁的外貌特征、历史事件、位置或航向等，不仅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反映了渔民对南海诸岛的深入了解。例如，永兴岛被称为“猫注”，即海神妈祖娘娘的转音；石塘、黄山马、秤钩等岛礁的命名则直观地反映了其外貌特征。而在时间上，《更路簿》的流传时间悠久，例如，卢业发祖传《更路簿》大约出现于 1846 年，为清道光年间，然后代代相传，历三世传给卢业发（夏代云、王崇敏，2016）。《更路簿》中对南海诸岛的系统命名，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南海渔民发现、命名岛屿的勇敢和智慧，也反映了我国发现和利用南海诸岛的时间较早。例如，苏承芬（1938 年生，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人，早年跟随父辈到西、南沙捕捞，后任船长）独创的中沙群岛的《中沙水路簿》，其中记载的五条到黄岩岛的更路尤为珍贵。

由东岛至黄岩岛用一百另（零）八度收，300 海里。

今注：从西沙群岛的东岛（北纬 16° 40'，东经 112° 44'）开往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北纬 15° 07'，东经 117° 51'），航行针向用 108 度航程 300 海里到达。

由浪花至黄岩岛用一百另（零）一度，300 海里。

今注：从西沙群岛的浪花（浪花礁：北纬 16° 01'-16° 05'，东经 112° 26'-112° 36'）开往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北纬 15° 07'，东经 117° 51'），航行针向用 101 度，航程 300 海里到达。

由永兵岛至黄岩用一百另（零）七度，324 海里。

今注：从西沙群岛的永兵岛（永兴岛：北纬 16° 50'，东经 112° 20'）开往中沙群岛的黄岩（黄岩岛：北纬 15° 07'，东经 117° 51'），航行针向用 107 度，航程 324 海里到达。

由东沙至黄岩用一百七十度，324 海里。

今注：从东沙群岛开往中沙群岛的黄岩（黄岩岛：北纬 15° 07'东经 117° 51'），航行针向用 170 度，航程 324 海里到达。

由潭门至黄岩岛用一百一十八度，470 海里。

今注：从潭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港）开往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北纬 15° 07'，东经 117° 51'），航行针向用 118 度，航程 470 海里到达。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

（二）中国较早开发、利用南海诸岛

在《更路簿》的指引下，海南渔民不仅穿行南海岛礁之间，还长住岛上进行生产，称为“站峙”（海南渔民方言称岛为“峙”，在岛上居住生活便称为“站峙”）（阎根齐，2024）。《更路簿》记录了渔民在南海诸岛的渔业生产活动，包括捕捞海参、贝类、龙虾等海产品，以及进行海上贸易等。渔民们不仅在岛上搭建房屋、挖掘水井、盖神庙、种植椰子树，还在一些岛礁上开垦田地，种植庄稼（《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编委会，2016）。这些活动表明，中国渔民早在元至明代时期就已经在南海诸岛进行开发和利用，使这些岛礁成为能够维持人类居住和从事经济生活的地方。

大罗孔土地肥沃，海南渔民常在此住岛生产，搭棚居住。文昌渔民还盖有茅草屋，在此住岛长达数年，在岛上种瓜菜、番薯、萝卜、椰子树等，还养猪，长有土茯苓，海南渔民去挖过。清嘉庆年间文昌铺前渔民蒙文宾曾来此住岛，此后有文昌龙楼宝陵的符鸿光、符鸿辉、符鸿能，文昌铺前林梧的彭思笃、彭笃彬。清澜的黄世熙，东郊良田的

黄守居、黄德庆、蔡家椿等。1927—1929年在南沙诸岛的文昌渔民王安庆说还见过黄守居、黄德庆、蔡家椿住岛盖的屋基约有1市尺高。1946—1950年陈永芹也见到黄德庆建的屋基是用水泥砌的。1935年公布名称为南山岛。1947年和1983年分别公布名称为马欢岛，以纪念明代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官马欢。

（资料来源：夏代云，著，王崇敏，编. (2016). 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46页）. 北京：海洋出版社）

（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实际控制

《更路簿》记录了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实际控制情况。渔民们每年有规律地到南沙群岛海域捕捞，并在岛礁上居住和生活。例如，文昌县（1995年，撤销文昌县，设立文昌市）的符鸿光在南威岛连续居住了8年，东郊镇上坡村的陈鸿伯则住岛18年。

南威岛尽管没有太平岛面积大，但上面丛林密布，林子里还有一口水井。船长派人砍下成堆的木材补充船上的灶台燃料。渔船在补给完毕后，卢业发和另外两名渔民被要求留守在南威岛上。白天，那两名渔民就地在礁盘上捕捞贝类、鱼虾，在岸上接应的卢业发负责将捕捞的渔获物进行简单处理后在礁石上晒干。不捕捞的日子，他们就砍伐岛上的树枝，在烈日下晒干，等待船只返回时拿上船作燃料。在这期间，两艘同样来自海南岛的渔船也停靠于此，补充淡水，并陆陆续续有人留下。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

海南大学人文学院阎根齐研究员指出，这样利用季风有规律地、几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航海和捕鱼作业，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从未有过的，也是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管理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阎根齐，2024）。这些渔民的活动表现了中国长久以来对南海诸岛的实际控制，也是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主权的有力证据。表1是南海《更路簿》作为南海维权证据的“核心证据抄本”（“核心证据抄本”是指完全满足《更路簿》三大类五个基本要素，即帆船时代，南海诸岛范围，航向、针位、纸张等三大类五个基本要素）及其部分信息，是南海维权民间证据的主要利器，也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张朔人、张若城，2018）。

表1 直接证据抄本及其部分信息

序号	名称	持有人	序号	名称	持有人
1	更路簿	苏德柳	12	更路簿	王诗桃
2	更路簿	许洪福	13	琼州行船更路志录	郑庆能
3	定罗经针位	郁玉清	14	更路经	冯泽明
4	西南沙更簿	陈永芹	15	驶船更流簿	黄家礼

续表 1 直接证据抄本及其部分信息

序号	名称	持有人	序号	名称	持有人
5	更路簿	林鸿锦	16	更路簿	卢家炳
6	顺风得利	王国昌	17	更路簿	陈泽明
7	注明东、北海更路簿	麦兴铄	18	更路簿[存目]	柯家裕
8	东海、北海更流簿	李根深	19	更路簿[存目]	符树万
9	更路簿	彭正楷	20	更路簿	吴淑茂
10	更路簿	卢鸿兰	21	顺风东西沙岛更路	佚名
11	更路簿	李魁茂			

(资料来源: 张朔人, 张若城. (2018). 南海维权的民间证据: 《更路簿》内涵与面世抄本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0(04), 26-35)

三、《更路簿》集体记忆的淡化与重构

我国南海航海前辈们, 用自己一次次的出海经历, 在《更路簿》上书写了自己走过的痕迹, 里面每一段文字, 都是先辈的亲身经历和经验。依赖《更路簿》而勇敢航行的每一代船员, 都将其视为冲破艰难的精神支柱。由此, 围绕着《更路簿》上面的文字, 一代代船员拥有了富有情感色彩与精神共鸣的集体记忆。然而, 这种集体记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淡化。

(一) 淡化的原因

1. 航海技术的发展取代了《更路簿》的作用

从风帆船到机帆船的技术升级, 使得南海渔业的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航海技术的升级更新是渔民集体记忆消退的重要原因(丁甲一, 2022)。20世纪70年代前, 木质风帆船一直是海南渔民出海捕鱼的重要工具(阎根齐, 2019), 随着造船技术的升级, 原先的木船逐渐被机船替代, 《更路簿》以往的功能和价值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现代导航系统日益智能化、精细化, 使得《更路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与之相关的集体记忆也日益模糊、消退。

2. 渔民生活的代际更替中前辈记忆的流逝

“记忆与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而每一个集体记忆的存在都需要特定空间里同时期存在的人相互之间的维系”(周尚意、成志芬、夏侯明健, 2016),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许多渔民不再以捕鱼为生, 而是转向其他职业或行业。随着老渔民的大量流失和社会职业选择的多元化, 当地年轻人极少继承祖业、出海捕鱼, 职业代际断层削弱了集体记忆的持久性和稳定性, 不利于《更路簿》及其相关的集体记忆的代际传承。

3. 传承和保护意识不强

传统中国是农业文明, 即使有海洋文明, 也是农业文明延伸发展所形成的海洋农业

文明，更遑论基于海洋文明的海洋秩序构建（王伟伟，2024）。因此人们对于海洋文明的保护意识较低，且社会转型和经济形态变迁导致渔民对《更路簿》的依赖和关注逐渐减少。《更路簿》所承载的海洋情怀、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面临消失的危险（王利兵，2019）。新一代渔民对于《更路簿》的了解和传承意愿可能不如前辈，《更路簿》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日益贫瘠，集体记忆面临着衰退、简化甚至消亡的危机。

先进科技的发展替代了原始的航海用具，依靠《更路簿》跨海越洋的渔民也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而后人们也缺乏保护和传扬《更路簿》的意识。最终，《更路簿》的手抄本明珠蒙尘，老一辈人们在南海上乘风破浪的英勇故事和灿烂文明，也成为历史长河中不起眼的沧海一粟。

（二）淡化的后果

集体记忆不仅包含具体的知识和技能，还蕴含着渔民社区的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更路簿》有关的集体记忆的淡化，对于南海渔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1. 文化传承的断裂

《更路簿》中记录了渔民长期积累的航海知识、海洋生态知识以及捕鱼技巧等，这些对于新一代渔民来说，是宝贵的实践指南。虽然现代运用高科技航海技术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学习《更路簿》中有关航海的知识技能，才能让新一代的渔民减少对外在科技的依赖，获得更多航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81岁的潭门老船长陈在清在他38岁掌握了父亲留给她的《更路簿》时（1973年），脑海中回荡出一个问题：机帆船比木帆船的速度快很多，用传统的计更方式来测量距离虽然不合适，天气预报又是现成的，那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更路簿还有用吗？但一次他在南沙、东沙、西沙等海域捕鱼的经历，让他明白了《更路簿》的重要性。

那次出海，38岁的陈在清开上了机帆船。船上配备了收音机，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天气预报。

当船行驶到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时，陈在清发现，海水开始变得浑浊起来，根据多年前父亲教导的判断风暴的经验，再加上对日落的观测，他判断很快就会有风暴袭来。他迅速驾船驶向附近的琛航岛躲避风浪，与此同时，收音机里传来了风暴即将到来的天气预报。

陈在清的船进港不久，风暴即呼啸而至，陈在清逃过一劫。风暴过后，他将船驶入东岛附近，只见整个岛屿一片狼藉，岛上的树枝都被狂风吹断了。陈在清觉得很庆幸，如果仅仅凭借天气预报判断天气，没有更路簿和父亲传授的那些经验，很难逃过这次大难。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

类似这种航海的知识与技能还有很多，而当《更路簿》被人们束之高阁的时候，与其相关的航海经验也难以随着《更路簿》一起传给后代、传向远方。未来新一代渔民可能需要从头摸索，增加作业的困难和风险。

2. 家国情怀的淡化

随着老渔民的逝去和社会职业选择的多元化，年轻一代越来越少继承祖业出海捕鱼，导致职业代际断层，削弱了集体记忆的持久性和稳定性（刘玄宇、张争胜、牛姝雅，2017）。这种代际更替和流动对《更路簿》集体记忆构成了冲击，使得传统渔民群体逐渐稀释，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也随之弱化。《更路簿》中蕴含了渔民对南海诸岛礁的命名、开发以及长期以来的渔业活动记录，这些都是中国渔民对南海主权的历史见证。老一辈集体记忆的淡化，一方面可能导致新一代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变得模糊，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对国家领土主权的认知；另一方面，渔民对“祖宗海”的深厚情感也可能逐渐淡化，影响了新一代渔民对国家的归属感。

3. 权益维护的艰难

《更路簿》集体记忆的淡化，不利于提升中国人的海洋文化自觉，这将影响海洋文化的创新与繁荣，进而影响海洋强国的建设。建设海洋文化强国，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合法海洋权益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我国海洋维权的政策立场和历史法理依据，提升海洋领域国际话语权（侯毅，2023）。《更路簿》作为南海维权的重要物证，其存在为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提供了历史法理依据，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要文献。《更路簿》相关的集体记忆淡化，将削弱中国在南海海洋权益维护中的历史文化支撑。

四、《更路簿》的海洋国土教育价值及启示

（一）教育的意义

1. 深入了解国土信息，增强学生对国家主权的认同感

对自己国家国土的认识和了解是增强学生对自己国家国土的深厚感情的重要途径。海洋国土教育应加强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而《更路簿》便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 and 认识我国的海洋国土。一方面，《更路簿》体现了南海渔民在航海中形成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渔民们通过长期的航海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海洋信仰、习俗和传说，这些构成了南海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情感。另一方面，《更路簿》记录了渔民们对南海诸岛的深入了解和长期开发经营，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拥有南海主权的重要证据。学习和了解《更路簿》可以激发学生的海洋国土意识，了解南海诸岛及海域对我国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让学生认识到维护海洋国土权益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 传播我国古代海洋精神文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

《更路簿》的内容，以及渔民们围绕着《更路簿》展开的故事，体现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海洋文明，学生了解《更路簿》的内容有助于学生改变对我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刻板印象，提升文化自信。2008年，海南省文昌市申报的“南海航道更路经”（俗称“更路簿”）首次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琼海市相继于2011年补充申报“南海航道更路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吴晨辉、张争胜，2022）。遗产包含着人们对过去的重新解读，是身份的重要象征和来源（Henderson Joan, 2001）。对遗产的回溯和珍视，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回归传统，而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人类自我。学生了解学习《更路簿》，其重点不仅在于学习和在生活中运用其中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在于领略我国古代普普通通渔民身上有着怎样的航海精神和航海经历。例如80多岁的老船长许书琳回忆自己年幼时惊心动魄的航海经历：

“我在一生中遇到过三次海难。遇到第一次时，我才12岁，在海上遇到台风来袭，因为来不及把帆降下来，也没把杆锯掉，船翻了，我跟爷爷在海上漂流了好多天。爷爷当时已73岁，天气冷，他太老了受不了，在海上被冻死了，我们也没有见到他的尸体。我爬进一个浮在海面上的筐里，顺风漂到岸边，被人家救上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伯既给我衣服穿，又给饭吃，我才活下来！”

（资料来源：《南海更路簿》）

《更路簿》记录了南海渔民在航海中面对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以及他们如何运用智慧和勇气克服这些困难。这些故事和经历不仅是对渔民们坚韧不拔精神的颂扬，也是对学生进行海洋国土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学习和了解这些故事，不仅可以提升学生遇到困难时的坚强不屈品质，还可以激发公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育建议

1. 加强《更路簿》的跨学科研究

《更路簿》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单一学科，而应整合航海学、地理学、信息技术、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以全面解读《更路簿》中的信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材料和视角。例如，通过数字化和可视化技术，将《更路簿》中的信息转化为易于理解和传播的形式。海南大学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利用航海学、地理学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将收集来的40余本“更路簿”及现存“更路簿”涉及的170余个岛礁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了高清影印图片数据库，实现了“更路簿”的可视化（李文化、吉家凡、陈虹，2019），这种数字化和可视化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更路簿》的内容和价值。

2. 加强《更路簿》的课程开发与建设

开发以《更路簿》为主题的教育课程，将《更路簿》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融入海洋国土教育中。在课堂教学当中传授《更路簿》的历史背景、使用情况以及它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重要性。通过南海岛礁建设、海洋资源开发等内容设计，融入“海洋国土”意识的教育，树立坚决捍卫国家海洋权益和祖国领海完整的信念。在课堂教学之外，也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如参观更路簿博物馆、听老船长讲述闯海故事、学习织渔网等，以增强学生对更路簿文化的理解。通过亲身体验，学生可以更深刻地感受《更路簿》的文化和历史价值。通过课内教学和课外活动，融入海洋主权意识教育，强化学生的海洋国土意识，激发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五、结语

《更路簿》作为一种内容丰富的海洋教育资源，对于提升学生的南海国土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气概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加强《更路簿》及其文化记忆的发现、研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凝聚民族团结意识。

参考文献

- 《南海更路簿, 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编委会. (2016). *南海更路簿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丁甲一. (2022). *南海更路簿文化的失忆与重构*(未出版硕士论文). 海南大学, 海南.
- 侯毅. (2023). *海洋文化建设的时代内涵与根本任务*. 检索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 自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 网址: <https://aoc.ouc.edu.cn/2023/0714/c9821a437514/pagem.htm>.
- 李文化, 吉家凡, 陈虹. (2019). 南海“更路簿”数字化与可视化研究. *数字图书馆论坛*, 4, 68-72.
- 刘玄宇, 张争胜, 牛姝雅. (2017). 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 *地理学报*, 72(12), 2281-2294.
- 刘义杰. (2017). 《更路簿》研究综述. *南海学刊*, 3(01), 9-21.
- 王利兵. (2019). 记忆与认同: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海《更路簿》. *太平洋学报*, 27(03), 50-60.
- 王伟伟. (2024). 传统中国海洋文明的兴衰: 基于国家海洋力量和民间海洋力量关系的视角. *人生与伴侣*, (15), 30-32.
- 吴晨辉, 张争胜. (2022).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地理科学*, 42(06), 1055-1063.
- 夏代云著, 王崇敏编. (2016). *卢业发、吴淑茂、黄家礼《更路簿》研究*. 北京: 海洋出版社.
- 阎根齐. (2019). 论海南渔民的航海技术与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力.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59(02), 195-204.
- 阎根齐. (2024). *《更路簿》历史上如何引航南海?*. 北京: 中国新闻网. 线上 检索日期: 2024 年 12 月 26 日. 取自: <https://www.chinanews.com/dxw/2024/05-24/10222830.shtml>.
- 张朔人, 张若城. (2018). 南海维权的民间证据: 《更路簿》内涵与面世抄本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0(04), 26-35.
-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16). *我们的更路簿: 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线上 检索日期: 2024 年 11 月 11 日. 取自: <https://tv.cctv.com/2016/07/14/VIDEu6kuFbCst8PIvEjITKiS160714.shtml?spm=C55924871139.PY8jbb3G6NT9.0.0>.

- 周尚意, 成志芬, 夏侯明健. (2016). 记忆空间表达及其传承研究: 以北京西四北头条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例. *现代城市研究*, 8, 11-16.
- 朱鉴秋. (2013). “方位不易指南篇”: 从编著《渡海方程辑注》谈古代海道针经. *海交史研究*, 2, 110-116.
- Henderson, Joan. (2001). Heritage, identity and tourism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7(3), 219-235.

Viewing China's Marine Land Education from the “Genglu Book”

LIANG Mingyue, WANG Qianqian, ZHANG Xuefeng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fisherm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o navigate in ancient times, the book is an important marine land education resource. Its content reflects the earl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fishermen in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he fad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Genglu Bu” in the pas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of China's marine culture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patriotism. Due to its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in enhancing students' sense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Genglu Book” sh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Genglu Book; marine education; land education

Funding: SRIP Project of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in 2025,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the Ningbo Gang Spirit: Taking Ningbo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anks for the support of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ourse “Primary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Author Biography: LIANG Mingyue, female,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holds a PhD in Education and serves as a doctoral supervisor. WANG Qianqian, female, a master's student at the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ZHANG Xuefeng, Ningbo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s (Ningb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